



自反縮不縮？

新聞系七十年

馮建三◎編



大記者。
記者的原典與作為
時間：1935-1993
地點：香港



我在新聞系的五十年^{*}

潘家慶

一、前言

民國四十三年，政大在台復校，四十四年恢復大學部，我跟政大就結下不解之緣。四十八年大學部畢業，當兵一年半，五十年四月應系主任王老師之召喚，來系做助教。一直到民國九十年政大退休，再任兼職。中間除了出國進修、研究三年半，留在新聞系裡，整整前後五十年。

五十年來，政大經歷了不少過程，也看過形形色色人物，閉起眼睛，不過是過眼雲煙。但新聞系五十年來點點滴滴，猶如昨天之事。這裡紀錄若干我親身經歷的小事，看看能不能為七十年的新聞系史，輕輕抹上一筆，增加她多采多姿動人的一面。

二、學生新聞

民國五十年代初期，系內有三位助教，首席為賴光臨，負責系務。次為劉建順，負責廣電實習。我則處理學生報刊實習。所謂報刊實習，負責每週出版一次的《學生新聞》週刊。

這份於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創刊的四開小報，實際由本班創立。早期似乎採明星制。所謂明星制，開始的前幾期，由當時研究生的姚朋、張宗棟等《新生報》編輯高手當綱，新聞則由研究生與本班少數同學採訪。我們一般同學，不過是二把手，在一旁見習打雜。創刊之初，實際是半月刊，推

* 本文作者除《傳播與國家發展》這本專書（該書序文收於本文集頁167-169）外，另出版左列專書或文集：《傳播媒介與社會》（1981，商務）、《新聞媒介·社會責任》（1984，商務）、《滴水集》（1985，帕米爾）、《發展中的傳播媒介》（1987，帕米爾）、《前進，還是倒退》（1990，帕米爾）、《媒介理論與現實》（1991，天下文化）、《國內媒體自我審查及自我評鑑現況調查》（1994，新聞評議會）、《媒介、歷史與社會》（2004，五南）。

斷應是民國四十八年改週刊。

不過這個實習報紙，連我們的系主任，似乎也所知不多。記得有一次睽違已久系主任謝然之教授來社「視察」。當時前呼後擁，猶如大官駕臨，見到眾生各在其位，連連點頭稱好。不知怎麼的突然問一個同學，「學生新聞，多久出一期？」濃濃的浙江口音，其實很多同學不曾聽懂，聽得懂的同學，反應是不太禮貌的——大有你是一家之長，連這個都不知道。

我提這個，別無他意，相較今日系主任，在系裡做牛做馬，任期一到，馬上走人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。那時若干系所主管，一節課都不用上，留下一枚圖章給助教，一星期來校開一次行政會議。不曉得那是真輕鬆，還是假輕鬆。我們不是那類人物，答案是莫宰羊。

王洪鈞老師接手主任後，應該是新時代的開始。我來系做助教，《學生新聞》已經逐漸上軌道，因為是週刊，故而稱之為《學生新聞週刊》，從民國五十年四月到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任職期間，近八年時間，全部心力，專注在看守這份實習報紙。

實習制度是，每位大三學生都要上下學期，各實習一個月。全班分六組，無分寒暑假，輪到實習，必須到職，否則重修。實習內容分編輯、採訪、發行、廣告。編採不用說，若干同學最「火」的是，每學期要拉四個訂戶，間而要出去叫賣報紙。另外每學期至少介紹兩百元廣告，同學可拿三成佣金。有一位同學就自掏腰包，寫下地址是寄「天國的胡適之」，我當時不依，硬要他補個實在的來。廣告糾紛更多，先跟同學溝通，說這是訓練的一部份，說不通，請他找王主任。王師剛柔並濟，細數報紙經營的根本——錢，就是要學生能認清問題，最後，學生也只好俯首稱臣。

當時我們的工作日程是：

星期六至星期二採訪；

星期二上午，專刊、副刊（即三四版）編輯，下午送廠；

星期三上午，一二（新聞）兩版編輯，下午送廠；

星期四下午（到中山北路建華印刷廠）邊看小樣、邊看拼版，最後大樣由助教逐字校看；

星期五晚上發行，發行之後是編採檢討會。

就這樣一日復一日，除了陰曆年的兩個禮拜休息，其他一律準時出報，代表的是一種做報的精神。

近八年的做報經驗，最困難的是校對，明明逐字校對，怎麼印出來，大標題就有不該錯的字。一直到今天，我還是最怕校對。那時不似今日開放自由，有一次一位同學介紹世界名著，寫了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。一般讀者不會有反應，好事者即以此相詢，引起一連串不安，驚動了系主任，找我去問話，籌商有問題時，應對之策，足足緊張了一兩個月。

由於不變的堅持，學生新聞由每月開銷困難，到自給自足（當然印刷費一直由學校支出），到我離開時，還有七八萬盈餘。後幾年新聞學會有活動，運動會找經援，學生新聞，都義不容辭。學生新聞聲望，則由各大報重視，或照抄新聞，或以學生新聞為線索，最是我們津津樂道的事。

晚期，學生新聞副刊也自成一格，記得我曾請陳世敏老師開闢「西窗小札」方塊，後來，他還出了專書。假如說報紙副刊是作家搖籃，學生新聞多少也培養過，不少現在已成名的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、劇作家...等等，只是很少有人提起而已。

做了八年，自己也老大不小了，於是毅然在五十八年三月，飛美讀書去了。

三、課程修訂

復校後的政大一切因陋就簡，在困頓的經濟條件下，有人說政大校園像兵營。然新聞系是政大的特色，所以在一片灰色的建築中，五十年十二月卻落成了一座系館——新聞館。次年三月九日落成之日，冠蓋雲集，當時美國總統甘乃迪，來函盛讚政大新聞教育，領袖群倫，譽滿遠東。

新聞館的設計、建造、落成實為前系主任王洪鈞教授的傑作，這是硬體方面。相對的，更重要的是軟體設計——課程改革。新聞系復系之初，因人才難求，復受制於有限的財力，課程多半因人設事，缺少整體、長遠規劃。洪鈞師循著理想（四十八年提出新聞教育為知識、技能、道德與方法四大教育內涵）、徵詢（五十年校慶召開了首次新聞教育座談會）、修訂（五十一年進行修訂）、評價（五十二年八月再約集學界、業界參與討論）；本系課程規劃於焉完成。

修訂後的課程，人文社會通識課程佔 64%，專業學科減為 33%。另外三四年級採分組，計分編採、廣電、新聞英文、廣告公關、報業管理，以及圖片新聞六組。此時把畢業必修學分提高為 137 個。五十四年教育部訂修全國大學新聞系課程，即以此為藍本。

這是五十年中政大新聞教育的第一次課程修訂。

四、現代文選

民國五十六年底，徐佳士老師返校主持系務。帶來了新聞教育上更廣寬視野，也讓政大新聞系，走出傳統，逐漸與世界學術接軌。

眾所周知，國內第一本大眾傳播理論著作，是由徐師那本通俗流暢，由記者公會所出版書籍，引領著我們前進。徐師前半生身在實務界經歷記者、編譯，與編輯行政的薰陶。他深知如何可以培養出一位專業記者。我印象中，他來系後影響最大的一次改變，首先是增設大二國文，加強學生的語文訓練。不過大二國文這個名稱，在體制上必須由中文系開設，要訓練記者的寫作能力，怕也會落空。於是徐師命名這門課程叫「現代文選」，分上下學期，八個學分。看起來這是一小步，卻是政大新聞系課程改革中的一大步，受惠的是後來二十多年廣大的學生群。很多人問本系同學，「四年中學了什麼」，多半是忘不了「現代文選」。

現代文選開始時由姚朋、賴光臨兩位老師授課。我在美國時，徐師指示回國後準備此課。直到回國飛機上我才想起此事，從洛杉磯到台北的途中，思考了足足十幾個小時，奠定了回來後教學的方式。

那時現代文選開了兩班，一班由賴老師授課，他強調的是文史哲方面，我則偏重基礎社會科學。上課方式採開放式教學，主要由同學掌控課堂報告、討論與成果展示。我則負責課程大計劃、進度、書單推薦，與作業評改。在教室中我坐壁上觀，課程終了十分鐘講評。上學期選書為一般基礎知識，寫作則偏重基本寫作訓練；下學期則分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、環保與傳播六單元選書，作業以分科及小組報告為重點。令人印象最深的是，在課堂成果展示中，常有精彩的內容出現，如廣播劇、田野調查、攝影調查、音樂欣賞、話劇、辯論、電影討論等等。那種授課方式，要同學們不來上課，的確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現代文選這種教法，維持了二十多年，最後甚至推廣到廣告系、廣電系。然而時代與學校結構改變，更可能是我們的學生中文程度，學問涵養進步了。因此在後來的課程改革中，由必修改成選修，由八學分改為三個學分。我則以時代任務已畢，辭卻再教這門課程。

徐師另一重要貢獻，便是「集中選修」的創設。為使新聞系同學將來能在通識涵養中，又可專攻一門。徐師自民國五八年正式推動集中選修，包括

政治、國關、經濟、企管、社會、法律等學門。學生在四年內，必修二十個專攻學分。在當時閉塞的大學體制中，要學生到另外一個系選修課程，困難度是非常高的。可是由於徐師口頭說服（對各系）成功，以及同學們用誠意與優秀的表現，打動了這些系。整體來說，這個制度可以說是成功的。許多同學因為集中選修，在畢業後，繼續考上了不同研究所。

這個制度實質上，也改變了政大選課僵固體制，因而奠定了政大後來的副修、雙主修的體制。這就是本系第二次課程修訂，對內對外重要的影響。

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兩點。一是徐師將所有語文課程，改採小班制，包括採訪寫作、新聞英語、編輯、與現代文選。在當時資源不多狀況下，確實難得，但對師生而言，卻可說是「利多」的創舉。

再一個就是新聞系圖書室，擴張成新聞系圖書館。館內藏書採開放式；原來購書經年的習慣，也在徐師力主下，新聞系需書由秀鶴行代理逕行採購。一本新書，大概兩三個月就可到館。在當時學校力主圖書館大統一的政策下，新聞系能爭取到一方淨土，成為全校唯一的系圖。他的期刊與圖書之豐，在亞洲來說，更是領袖群倫，無出其右者。

五、學程制度

新聞第三次課程修訂，應該從民國八十四年開始，在鄭前院長瑞城領導下的努力。當時是在大一大二不分系的理想下，展開研究、設計、諮詢、討論、表決，歷經一百多次會議，兩年以後完成了學程制的設計。民國八十九年王前院長石番，再檢討學程制的得失，加上翁前院長的努力，成為今日之制。

新制規定學生畢業學分，一律以教育部規定的 128 個學分為根本。這個規定遠比以前學校、系級要求，大為減少。就在這個前提下，改革分別在傳院三系各設兩三個學程。新聞系而言，計有新聞編採、國際傳播、與網路與多媒體三個學程。本系學生必選本系任一學程，另可在院內他系，選修一個學程，甚至兩個學程。學程之下再設模組，模組中設計多種進階課程，任同學精進個人的專業能耐。

這個設計，可說是個理想的設計。理想設計下，必須對過往的，有完全不同的做法，包括：

——大量減少必修課，包括若干文史科目；

——每學科都修成單一學期，三學分；

——過去的集中選修制，改由輔系、雙主修制取代；

——最重要的是，這個改革催生的是，我們的教育哲學，本系教育目標，大學教育體制，跟學生自我選擇能力與成長等。老實說，它需要長時間的試煉。

至少在試煉的過程（五年至十年），我們必須考量的是，我們真的大一大二不分系？學程制度不能推廣至全校，那麼意義很有限？配套措施包括學業導師制有無建立？模組課程有無盡量增設？既有老師心理上是否已準備迎接這個大方向？更現實的，新聞系畢業生的競爭能力，是否在提升？

個人覺得，餅畫的好看，固然重要，但必須實用（好吃），有效。美國大學，我至少讀過兩個不錯的。他們是開放的，自由的，但「餅」只在內部畫，端出來的「牛肉」卻是簡單、自由、彈性。那就是系內設計的，只是必修課程。選修課程是無邊的，修習體制是學校的事情。

抱歉，談課程修訂，我已超越了自己規定的「紅線」，趕快煞車吧！

六、兩項研究

民國六十一年秋天，我從美國回來，徐師要我在研究所開一門「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」，這正是我在明尼蘇達副修社會學的中心議題之一，「社會變遷與知識份子」。記得當時，我曾以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，寫了一篇論文，作為我的 Plan B 三個報告之一。

當然傳播與國家發展的範圍，遠較社會變遷為廣，正好我有國際傳播的系列課程背景，開起課來不難。問題在如何整合各科的經典理論，像 Schramm 1964 的 *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*，Lerner 1958 的 *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*，Moore 1963 的 *Social Change*，Rostow 1960 的 *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*，Pye 1963 的 *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*，McClelland 1961 的 *The Achieving Society*，以及青壯一輩代表的 Rogers 1976 的 *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* 的挑戰。記得頭一兩年準備這門課，日以繼夜，既辛苦，也很甜蜜。其實幫忙這門課程的是，本系的團隊合作研究。

自六十一年底開始，在徐老師領軍下，我跟楊孝滌、趙嬰、鄭振煌、張寶芳在國科會的贊助下，五年裡，先後完成了四個全島的調查研究報告，它們是：

《台灣地區民眾家庭計畫傳播模式：通道、訴求與反應》民 64

《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》民 64

《台灣地區民眾傳播過程與民眾反應之研究》民 65

《改進台灣地區大眾傳播國家發展功能之研究》民 66

調查研究，是全島性的，在歷史上是首創的。它所得到的數據，是科學實徵的；當然對新聞系所來說，也是史無前例的。不過真正的貢獻，是它們提供了學界研究的基本素材。

本來類似研究，應該每三年或每五年重做一次，俾從長期觀點，可以找到一個可以統計的曲線。由於財務支援問題不易解決，導致後來只能作不定時的研究。以後由我主持，王石番與謝瀛春老師三人合作研究，尚有以下三個成果：

《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研究 1986》民 75

《台灣地區大眾傳播與議題設定之研究》民 79

《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 1993》民 84

這些研究都在主流理論之外，找到了本土實徵資料。兩者相互印證，為教學、研究，找到了最好的幫手。一連串的研究，更助長我希望深入堂奧的衝動。

民國六十七年，我獲國科會獎助，赴美入史坦佛大學傳播研究所，擔任訪問學人。我選這個學校，主要是前述羅吉斯（Rogers）教授，以研究新事物傳播起家，自 1960 年代末期投入傳播與發展，先在農業現代化，後來在家庭計畫上著力。最後，帶領了一批中南美洲學者專家，反思史蘭姆當初創建的這個領域。史坦佛自然成為這個領域的重鎮。羅吉斯順理成章成為我的學術顧問。彼邦一年，聽課、討論，參與研究的同時，個人對於學問、研究與發展中國家問題，獲得了進一步的體認與了解。

傳播與國家發展這門課，也促使我個人在民國七十二年完成了一本整合性的專著，由新聞研究所出版的《傳播與國家發展》。但這個議題，在史坦佛時，已看出它發展的端倪。當時史坦佛醫學院參與，研究禁煙，以及後來防治愛滋病傳播問題。原先國家社會的大問題，務實地走向健康傳播，也就是早期講的醫療傳播。「國家發展」在二十一世紀開始，似乎已經走下了舞台。

再者，由於海峽對岸的情勢改變，文革之後，鄧小平力倡改革開放。我

們這邊也有許多反應，在學校方面，民國七十一年春天，當時新聞所長李瞻師有鑑於此，相商於我，讓我在研究所開一門「大陸傳播制度研究」。盛情難卻，更因為在明尼蘇達的最後一年，我全神貫注在中國近代史，與共產黨下的中國大陸的興趣，使我欣然答應。私下也有一種使命感，企圖為分裂了四十多年的兩岸，做一點彌合的工作。

除了歷史部分，資料難找，參考書籍亦多限於美國方面第二手，甚至是三四手的研究成果。國內所有則多屬「匪情研究」的論述。這種情況，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，雙方開始交流，方獲改善。學術界第一個團體往北京訪問，就是由王洪鈞教授率領的「大眾傳播教育協會訪問團」，九月二日正式登陸。我有幸參加，最大收穫是資料收集，展開了新頁。以後每次去大陸，都會大包小包，帶回對岸具體資料，對於中共的研究與教學上，產生了莫大便利。民國八十三年，學校有一個整合大型研究計畫，針對大陸各社會科學作一整體評估。我與賴光臨教授，聯合向國科會提出《大陸新聞學的發展與評估》研究計畫，最後獲得通過。我們用深度訪談的方式，分別訪問了北京、上海與武漢三地重要新聞學人與媒體負責人。八十五年交出了報告。八十五年個人再提《大陸新聞改革研究》計畫，獲國科會贊助，次年交出了報告。

兩次大陸內地的訪問研究，對彼岸的了解，可說是更上層樓。對於我在研究所講授「大陸傳播制度」，幫助很大。不過因為政治氣候的轉變，這門課的學生越來越少。據某些同學告訴我，有人說，那是中國的事。更有人說：「大陸制度較我們為劣，為什麼要去學他。」這些理由，不禁令人聽了嘖飯。

七、廣電學系

在整個社會封閉的年代裡，學校人事安排一直是神秘的，叫人摸不透的。就在那個年代的末期，民國七十七年五月的某一天，文學院長王壽南教授來找我，說校長希望我出任即將成立的廣電系系主任。我一時木然，久久醒不過神來。到今天，我還是不知道，是什麼因素，或者是什麼機緣，給了我這麼大的挑戰。

創辦新系幾個重大的工作，莫過廣電系的教學目標，課程擬定，教師尋覓，以及場所和設備的購置。

一開始先找助手，當時新聞系廣電組助教黎雅麗，力薦新聞系應屆畢業生郭乃華，我一口答應。有她的幫忙，做起事來非常順當。後來他跟我到傳院，至今每位院長莫不盛讚他的工作效率與能耐。這雖是小事，卻是很重要

的一步，不能不提。

首先我在第一年，一方面忙於迎接新生，一方面全力做書面徵詢意見，對象也包括新聞傳播界學者，廣電實務界優秀工作者，以及社會科學界學者。徵詢內容包括，建系目標與課程擬定。接著舉行了至少三次的正式座談，用徵詢意見為藍本，求教於各界。結果最重要的是，確立廣電系的目標，在培養「廣電新聞」，與「廣電節目編劇」人才。前者是新聞系廣電組原有的傳統，後者是為廣播、電視節目腳本寫作人才作準備。眾所周知，廣電乃至電影，中外皆然，水準較高的，必然有良好編劇寫作人才，其實並不繫於最新的科技與設備。再說技術設備，以學校有限的財力，永遠跟不上業界。

課程方面，初步決定仿新聞系的課程標準，前兩年培養基本能力，包括語文、社會科學、以及廣電基礎概念；三四年級則進行廣播、電視相關技術與專業課程。廣電系一如新聞系，採集中選修制，二十個學分。以便在通識中，培養學生社會科學中的專長。實行的方式，我要求每一位導師，協助同學做四年課程規劃。二年級即自行擬定未來三年要選修的課程，三年級時可以修改一次。計畫書改變，必得導師之同意，以免同學唯營養學分是賴。這個制度在政大首見，在國內亦不多見，問題的癥結在導師是否敬業，否則難有效果。

接下來是找人，那時全台灣念到廣電及相關博士的人只有三位。我便緊盯其中一位，收集他的資料，打探他的為人，到他學校旁聽他講課。最後，終於請到了他來學校幫忙。我所以這麼做，目的無他，求其慎重。整個找人過程中也得罪不少人。有人要我自我評量，至今想來，不過勉強及格。對證後來掌理傳院，發現要做事，找人卻又不易，實在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事。

廣電系成立之初那幾年裡，國家財政情況不錯，教育部門的擴張，幾年之內就有倍數之成長。在設備購置方面，所需經費，可以說不虞匱乏，加上那時關尚仁教授既有計畫，又懂採購，省卻了我個人許多麻煩。今日他能主持全校總務，並非偶然。

依照設系目標，廣電新聞，新聞系的資源可以運用，但在編劇方面，我的中程目標是培養編劇人才。所以有戲劇、電影背景，以及寫作一把手的人，都在我努力爭取之列。校內西語系司徒芝萍；校外約請學電影的焦雄屏，學戲劇即將拿 PHD 的蔡琰；以及在電影、攝影、以及寫作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郭力昕、盧非易。這個計畫如果能夠持之以恆，政大廣電系，必將為廣電電影軟體人才輸出的中心。

大學任何一個科系——特別是學科過於分化後的科系，必須依賴其他學系的相互支援，方能成其大。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這方面，政大沒問題。廣電系所缺為藝術學科的素養，像音樂、美術、戲劇、電影各科的支援。

幸好，民國七十年代後期，政府的財力不錯，教育部鼓勵各大學，擬定十年長期發展計畫。就在我任廣電系主任那幾年，學校要求訂定學校長期計畫。多次會議中，我提議增設藝術學院，我們希望有音樂、美術系，西語系方面，倡增設戲劇系；另在傳播學院，我建議增設電影系。這計畫並訂定先後順序，至少希望十年後能設齊。可是後來政府財力由盛而衰，學校負責人兩易，其中一位，講究「成本」觀念，也就是投資與報酬率要相配，以致後來計畫一再收縮。藝術學院成了泡影，連電影系也未能成功。廣電系再變更計畫，聲請設電影所，計畫送出去兩次，都被打回。外校的審議，認本校無設置電影所的資源，包括人才與設備，嗟呼，夫復何言！

八、傳播學院

民國八十一年五月，張京育校長以我是當時三系少數資深教授之一，邀我出任傳播學院院長，廣電系則交由關尚仁教授負責。院長所能做的具體工作不多。當時主要是開會，開會，包括系級、院級、校級、以及校外邀約，代表傳院。後來由於學校行政體系的結構漸變，傳播學院自我就任，開始動起來。

我針對平日大家詬病的事情先做，一上來將院務會議改為代議制，各系推代表參加。另外院內各種會議，採開放形式，歡迎任何教授自由參加。實行不到一年，就有人出來反對，力主大家一體參加，結果個人的想法，算是失敗了。

我到任之後，院內便推動 1993 年一次全球華人傳播教育研討會。籌備會歷時一年，募款達四百多萬，終於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七至三十日，在桃園國際機場旅館，舉行「1993 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」。出席者包括了全球華人傳播學者，更且首次邀請了大陸重要大學的新聞、傳播學者十八人與會。大會可謂盛況空前，除了與會人員的論文發表，人員交流，爲了延續會議成果，院內最後創辦了《傳播研究簡訊》。校際之間更由鄭瑞城教授在大會草擬，討論的「中華傳播學會」，後來成爲台灣地區傳播學術社區。同時兩岸之間，也由此持續擴大交流合作的項目。

就任院長之初，新聞系原有的「研究發展中心」，轉移至院，我爲了正

式推動全院的研究發展與出版工作，幾經向學校申請專職人員，處理研發事項，最後終於如願。

傳播學院在教學上，在我任內，首先推動整合三系共同課程，第一個目標就是三系共同科目「傳播理論」，推動內容及整合三系老師，開班不分系，同學可自由選修任一老師的傳理。這一嘗試，似乎也變成前面所說的第三次課程修訂的先聲。

傳院成立後，我們的人力與配備，不斷增加，原有的新聞館，與傳院大樓已不敷使用，致使各系人馬分散兩地。任內最後一年，全力推動，籌建傳播學院新館，務必使全院人力與設備集中，俾促進便利與效率。這工作頗不容易，但至少我離院時，學校瞭解，並承認我們有新大樓的迫切需要。後來幾任院長雖然一再努力，都未成功，但傳播學院新大樓，應是我們長期追求的目標之一。

此外，我在院長任內，還有一個想法，除了出版傳播學術專著，更要出版「傳播研究集刊」(Communication Research Monographs)一種，以容納院內外同仁，較長篇的論文專著。經我一再努力奔走，院長下來，我做志工，直至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方將這個集刊接生。

現在要倒帶回溯一下，我在院系所辦的幾個刊物。

1993 年全球華人研討會後，爲了不使這個會議很快結束，我用《傳播研究簡訊》來維繫此一會議的香火。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了試刊號。試刊號的發刊詞內，我舉出這個刊物要傳遞的訊息，是「那些人」，「作了些什麼研究」，「發現了什麼」，「透露了哪些相關資訊與數據」，附帶的，「有哪些建議與展望」。這個刊物以後每年三、五、十、十二月出版四期，一直持續至今，成果豐碩。

在廣電系主任任內，一直鼓勵同仁，研究發表，但成績不是很顯著，最重要難處，是沒有發表園地。於是自七十九年起與同仁積極籌備，終於在八十一年七月《廣播與電視》創刊號出版了。創刊號中除了研究論文，還包括碩士、學士相關論文，新書選介等內容。以後每半年出刊一次，一直維繫至今。後來院內檢討起來，認為廣電期刊與廣告系的《廣告學研究》似乎多餘了。但是仔細想一想當年不創此刊，怕到今天，廣電系同仁的研究，仍無處可以發表。

再回溯到民國七十六年初，新聞所長李瞻師，希望我接掌《新聞學研究》

編務，我也以自己有一番想法，毅然接受。七十六年汪琪接所長，七十七年二月，我主編的四十集出版，消化了原有稿件，並使內容多元化。在該期編者的話中，預言次期將作大幅度改版。

時隔一年，七十八年四月四十一集出版，版面擴大，內文改橫排。七十九年一月出版的四十二集，正式請人匿名評審，增加論文節要。並且希望以後出版時間規律化，每年一月七月出版。七十九年七月出完四十三集後，我也力主人事制度化，下台一鞠躬。

九、研究方法

民國六十五年開始，便有研究生跟我寫論文。到今天據估計，包括三篇博士論文，近四十篇碩士論文。其實我自認個人並無充分的素養，可以指導學生論文。然三十年來指導經驗，讓我有不少感觸。前面二十年，研究生有一定文字水平，這方面不必煩心。近十多年每篇論文，我都逐字閱讀，常常不禁要擲筆三嘆！最主要是他說一件事，卻不知道他在說什麼。更多的是文句冗長，不通，標點不知如何點，整個論文沒有理則順序。這問題屬於整個時代、社會的，希望現在少數人提倡「搶救國文」運動，能夠在不久後，有些成果出現。

更大的問題是，三十年來，我們的學生，多半不懂如何做論文。簡單來講，對研究方法，沒有什麼具體、正確的概念。這問題可就是研究所，研究方法的教學問題了。

這當然不能怪學生，問題是我們研究所課程規劃，教學資源配置，與實踐方法幾個環節，必然是出了問題。

根據個人在國外的經驗，美國大學研究方法，概念問題多由不同教師先對不同研究方法，作觀念上介紹。其他如實際操作，多令學生跟老師作研究，也就是「從做中學」的師徒制。

我請教過系內若干老師，有人也同意我的看法，認為是徹底改變的時候了。這個改變是否可以整合院內，甚至全校這方面師資，將各人專長加以分類。然後每個系，設定幾種研究方法，如調查法，內容分析，實驗法，文獻法等等，不同老師，傳授他自己專長方法概念。教學時間以三分之一作演講，三分之二則出題，要學生自行操作，務必使學生，對一個方法熟稔，方得授予學分。

當然最好的方法，還是學生選定老師，參加他們的研究小組。但在我們的老師研究風氣尚不鼎盛的狀況下，短時間恐怕不易做到。如果能做到，那時，學校就不必愁，我們教師研究成果，趕不上別人了。

研究是大學的生命線，只有會作研究的老師，才有會作研究的學生。此事急不來，但必須有決心，有計畫，有步驟，若能從現在開始，十年八年之後，情況必可大為改觀。到那時，我們做老師的，在指導論文時，就可用正常的方式，指導學生論文，不必像今日這般「痛苦」了。

十、結語

上面是五十年來，我在新聞系，傳播學院任教，擔任行政職務，所見，所感，親身參與的一些回憶。我說的大事，也許不是了不得大事；我所說的小事，也並非小事；我沒說的，可能更勝於我已說的千百倍；我說的不一定對；我所感受的，只是一己之見。

由於不同背景，不同識見，不同認知，就有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話語。千萬別太認真，不過是個人的一些不算精確的記憶，跟主觀的偏見。如前面所說，希望這些小事，可以為新聞系的大歷史，增加一些零碎的資料而已。